



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内在机理与启示

——以斯坦福教育政策分析中心为例

张琪¹,李旭东²

(1. 浙江理工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杭州 310018;2. 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英国伯明翰 B152TT)

摘要: 高校智库影响力的提升是发挥其“政策发动机”作用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和组织生态理论构建“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三维框架,以斯坦福教育政策分析中心(以下简称“Stanford CEPA”)为例,分别从结构、功能和生态系统三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力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Stanford CEPA 在结构上构建了“指导委员会—跨学科研究团队”两级治理体系,在资政建言、学术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研究、人才培养等功能上贡献突出,并形成了“高校—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多元共生网络,持续扩大其政策、学术以及社会影响力。我国高校智库可学习与借鉴 Stanford CEPA 的做法,通过优化组织架构和制度设计、推进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拓展社会服务职能以及提升政策转化效能等措施提高影响力。

关键词: 教育智库;斯坦福教育政策分析中心(Stanford CEPA);斯坦福大学;影响力;世界一流高校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6)06-0378-08

Internal mechanism and implications of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think tanks i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aking Stanford 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s an example

ZHANG Qi¹, LI Xudong²

(1. Offic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Birmingham B152TT, the UK)

Abstract: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based education think tanks is crucial for them to function as "policy engines". Based on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function-ecosystem" framework. Taking Stanford 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Stanford CEPA) as a case stud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its influence enhancemen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ructure, function, and ecosystem. It is found that Stanford CEPA has established a two-tier governance system consisting of a steering committee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eams. I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functions such as policy advice, academic research,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Furthermore, it has formed a multi-stakeholder symbiotic network involving universities, governments, media, and the public, continuously expanding its policy, academic, and social influence. Chinese university think tanks can learn from and draw on the practices of Stanford CEPA, and enhance their influence by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promoting problem-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 expanding social service

functions,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think tank; Stanford 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Stanford CEPA); Stanford University; impact;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智库(Think Tank)是汇聚多学科专家学者专业知识以跨学科方法进行政策研究的专业性机构,其职责包括开展研究、生成知识,并运用基于证据的论据来指导、影响政策及其实施效果^[1]。高校智库是智库的一种特殊类型,一般依托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广泛社会声誉的研究型高校设立,以高校下设机构的形式存在,兼具政策研究与人才培养双重职能。在知识密集型社会,智库与高校的关系日趋紧密,高校智库凭借专业研究团队以及出色的建言资政能力,在政府决策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13年4月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标以来,我国智库尤其是高校智库蓬勃发展。据统计,高校牵头建设了38%的国家高端智库,承担了90%以上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然而,《2020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显示,美国有5个智库入选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榜单前10名,而中国却无一智库上榜^[3]。这一数据反映了美国智库在国内治理与全球公共政策领域均具有显著影响力,而我国高校智库的国际竞争力仍存在明显差距。

关于高校智库及其影响力的研究主要聚焦高校智库的运行机制、功能、影响力及其评价等多个维度。一是高校智库的运行机制研究。高校智库的运行机制是盘活高校人才和研究优势资源、激发专家人才从事智库研究的积极性,从而建设高质量智库的关键所在^[4]。多数研究以个案为例,对世界一流高校智库的运行机制展开深入剖析,涵盖人才流通、经费筹措、成果转化^[5]以及实践和管理机制^[6]等维度;另有学者通过对国内20所优秀高校智库的网络调研,指出我国高校智库仍存在依托学科不均衡、缺少专职行政管理团队、成果开放程度不足、品牌意识薄弱等问题^[7]。二是高校智库的功能研究。国外研究侧重高校智库的“知识经纪人”(knowledge broker)角色,认为高校智库主要作为知识中介,为政策制定提供决策的实证依据^[8]。国内学界对高校智库资政建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等功能达成共识,如有学者对2015—2025年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经验进行总结,指出高校智库以咨政为使命,以人才为根本,以创新为驱动,在决策咨询、社会

服务、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4]。三是高校智库的影响力及其评价研究。国外大部分研究认为高校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源于其资政建言能力,针对智库影响力评价的研究多聚焦于评价指标和方法的探讨,研究视角相对局限,且缺少明显的认识论指导^[9]。国内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评估高校智库在政策、学术、社会以及国际等方面影响力的静态表现^[10];二是剖析高校智库影响力形成的动态过程,如有学者从发展导向、人才吸引、人员管理以及组织管理等四个方面对国内一流高校智库影响力进行分析,发现融入政策制定网络、维持组织公信力以及打造政策品牌等,是其影响力提升的主要路径^[11]。

综合梳理已有文献可知,当前研究或从“结构—功能”视角,或遵循“运行机制—影响力”逻辑,对美国高校智库的建设经验进行了提炼总结,为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然而,鲜有研究从认识论层面出发,结合结构、功能与生态系统多重要素,系统阐释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影响力的生成与提升机理。鉴于此,本文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和组织生态理论,构建高校智库影响力的“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三维分析框架,选取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典型代表——斯坦福教育政策分析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Stanford CEPA)为研究个案,系统剖析 Stanford CEPA 的组织结构、主要功能及其所处生态系统,探究其作为世界一流高校智库的影响力提升机理,以期为我国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一、“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影响力分析的三维框架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系统由特定的结构或组织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且每一部分都对系统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12]。具体而言,不同组织机构承担不同职能,组织结构是衡量组织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依据。组织生态理论则指出,所有组织都处于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在该系统边界内,不同属性的参与者遵循不同的决策和行为准则,且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相互影响,形成动态行为链,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扩张或衰落^[13]。可见,结构功能主义与组织生态理论分别从组织内部、外部两个维度,

为分析组织发展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基于这两大理论构建高校智库影响力分析的“结构—功

能—生态系统”三维框架(见图1),有助于全面系统地剖析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形成与提升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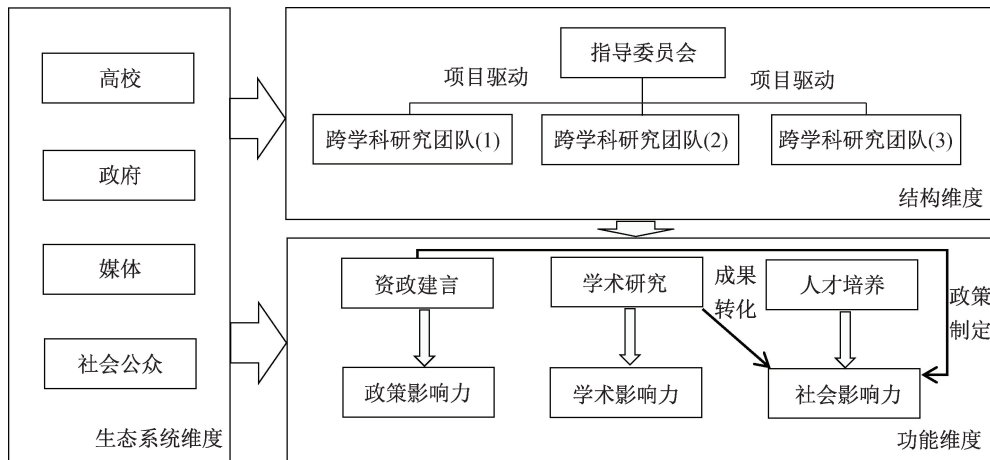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影响力分析的“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三维框架

在“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三维框架中,结构维度聚焦高校智库的内部组织结构,重点分析其在学科、人才等资源利用方面的优势,及其为资政建言、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功能的有效发挥所奠定的组织基础。功能维度侧重高校智库的职能和作用,动态分析其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核心职能,从而持续提升政策、学术及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智库的资政建言功能通过推动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功能通过促进成果转化,从而扩大智库的社会影响力。生态系统维度主要面向高校智库所处的外部环境,研究高校智库与高校、政府、媒体、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如何构建共生网络,以及这种共生关系如何作用高校智库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从而推动其影响力持续提升。这一框架不仅从高校智库内部搭建了支撑高校智库功能实现的组织架构,而且从外部探讨了保障高校智库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能够全面揭示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内在机理。

二、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内在机理:以Stanford CEPA为例

Stanford CEPA 创建于2009年,主要依托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建立。斯坦福大学不仅是美国教育政策联盟的核心成员,其教育政策专业更是在2023年U. S. News教育政策专业排名中位列第一。Stanford CEPA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学科、人才等资源优势以及自身组织结构优势,致力于推动教育制度改革与发展、促进大规模实证研究以及培养复合型教育政策研究人才,通过资政建言、学术研

究以及人才培养在“高校—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多元共生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升其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以及社会影响力。接下来将结合上文构建的“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三维框架,从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三个维度分别分析Stanford CEPA 这个世界一流高校智库提升影响力的机理。

(一) 结构维度:Stanford CEPA 的两级治理体系

在组织架构层面,Stanford CEPA 搭建了“指导委员会—跨学科研究团队”两级治理体系,为组织机构的有序运行提供了规范的制度框架。其中,Stanford CEPA 设有专门的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统筹中心整体运行、制定发展战略及开展综合管理工作。委员会下设专业化研究队伍,人员结构多元且层级清晰,根据官网最新信息^①显示,Stanford CEPA 现有研究队伍包括斯坦福大学的19名教师(其中6名为指导委员会成员)、5名行政人员、33名研究生、16名本科生,同时吸纳全球范围内的访问学者和交流学生共同参与研究工作^②。Stanford CEPA 以现实社会中的教育政策难题为研究导向,依托各类学术项目整合校内多学科优质科研力量,组建专项跨学科研究团队。各团队实行独立运作模式,以项目为纽带深度参与中心治理。依托协同创新研究项目,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可结合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元理论视角剖析政策议题,协作形成可行性、实践性更强的决策建议,有力推动

① 检索日期为2026年5月6日。

② 参见Stanford CEPA 官网: <https://cepa.stanford.edu/who-we-are>。

了教育政策体系的优化与革新。这种组织模式打破了传统院系划分和学科壁垒,为 Stanford CEPA 资政建言、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组织基础。此外,Stanford CEPA 将分散的资源整合到专项研究项目,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激发了科研创新活力,助力 Stanford CEPA 产出丰硕的学术成果。自成立以来,Stanford CEPA 围绕儿童发展、择校机制、课程教学、教育治理、教育公平、教师培育、外语教育等关键领域产出了许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已累计发表近 400 篇期刊论文、出版 110 多部专著^①。

(二)功能维度:Stanford CEPA 的职能与作用

Stanford CEPA 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影响力,源于其在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三方面的综合贡献:依托高质量资政建言夯实政策话语权,提升政策影响力;凭借前沿基础研究引领学术发展,筑牢学术影响力;通过输送复合型政策研究与实践人才,扩大社会影响力。

1.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教育制度改革与发展

在资政建言方面,Stanford CEPA 致力于破解美国教育政策领域兼具紧迫性与长期性的现实问题,通过输出专业决策建议与改革方案,深度介入公共教育政策制定与优化。作为“斯坦福挑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Stanford CEPA 的研究布局始终与斯坦福大学优化 K-12 教育质量的整体战略高度契合,研究范畴涵盖斯坦福教育数据档案、早期儿童教育、教师政策研究等多个关键领域。这种立足实践需求的研究范式,既实现了科研资源的合理配置,又保障了研究成果的现实适配性,有效回应社会真实治理难题,持续推动美国教育政策与实践体系的完善升级,进一步强化了自身政策话语权与政策影响力。

例如,由加州多位政府官员主导推动,旨在全面掌握加州学校财政和治理状况的大型专项研究项目“深入了解事实:一项研究加州学校治理与财务体系的研究项目”(Getting Down to Facts: A Research Project Examining California's School Governance and Finance Systems),集中体现了 Stanford CEPA 鲜明的问题导向研究特征。该项目由 20 多项子课题组成,汇聚了来自 32 家机构、拥有多元专业知识和政策立场的专家学者,最终形成 23 份专项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系统梳理加州学校财政与治理运行现状,厘清教育资源配置的现实阻碍,量化测算学生发展目标的实施成本,为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提供

了客观参考依据,成为加州教育治理改革与制度优化的核心事实支撑^②。该项目是当时全美规模最大的独立教育调研项目,因其对政策产生持久且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教育报告之母”。

2. “基于证据”,促进大规模实证研究

在学术研究方面,Stanford CEPA 强调通过大规模调查和数据分析开展具体教育政策评估,依托对教育环境的深度解析、创新性数据应用以及严谨的实证分析,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可靠的实证依据。Stanford CEPA 这种基于大规模数据的实证研究范式,一方面确保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政策说服力,扩大了其在数据应用领域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打破了学科壁垒、促进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其在领域内的学术引领地位。Stanford CEPA 在教育公平、联邦与州教育政策、教育技术创新、教学发展和治理效能等核心研究领域均居于领先地位^③。

例如,斯坦福教育数据档案(Stanford Education Data Archive, SEDA)是 Stanford CEPA 践行“基于证据”研究方法的代表性成果。SEDA 是美国首个全国性学习表现数据库,旨在公开美国教育状况、教育环境以及学生学业成绩数据。通过开发应用程序、撰写研究报告和互动文章,SEDA 对美国所有社区的教育机会进行评估,为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教育管理者以及家长全面掌握学生学业情况、探索教育机会优化路径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该数据库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证证据库,从平均测试成绩、学习进步率以及考试成绩趋势三个维度,以可视化方式对特定学区或社区的教育机会进行全方位展示与诊断^④。SEDA 注重对数据的动态追踪,结合特定历史、经济及社会背景开展深度分析,助力政策制定者精准识别美国教育系统的结构性短板,明确政策干预的关键节点,进而制定出切实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改进方案。基于 SEDA 提供的大规模实证数据,Stanford CEPA 产出了一大批高水平学术成果,进一步增强了其学术话语权和

① 参见 Stanford CEPA 官网: <https://cepa.stanford.edu/publications/journal-articles>。

② 参见 Stanford CEPA 官网: <https://cepa.stanford.edu/content/getting-down-facts-school-finance-and-governance-california>。

③ 参见网页: https://browse.library.kiwix.org/content/wikipedia_en_all_maxi/Center_for_Education_Policy_Analysis。

④ 参见 Stanford CEPA 官网: <https://cepa.stanford.edu/seda2/data-download>。

全球影响力,奠定了其作为世界一流高校智库的重要地位。

3. 以人为本,培养复合型教育政策研究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Stanford CEPA 将人才培养列为核心使命之一,依托自身在跨学科知识生产与政策决策转化中的优势,通过设立博士后项目、开展博士生培训、提供本科生研究助理岗位等多种方式,为学生提供参与前沿教育政策研究的实践契机,助力学生在具体实践中掌握教育政策分析能力,为教育政策分析领域输送了大批具有专业研究与分析能力的复合型教育政策研究人才。

Stanford CEPA 的博士后研究项目主要汇聚专注于定量教育政策分析的研究人员,由教育科学研究所提供为期两年的科研资助,重点支持三大类教育政策议题研究,包括旨在提升低收入及学业表现欠佳学生学业水平的政策、影响英语语言学习者的相关政策与实践,以及优化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成果的政策与实践。Stanford CEPA 的博士生培训项目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跨学科教育政策定量分析培训项目,主要面向对定量教育政策分析领域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及教育学学科博士生;二是教育定量研究证书项目,为全校对教育定量研究有需求的博士生提供专业课程,并为完成课程学习的博士生颁发证书,以证明其经过严格的定量研究方法训练,且具有定量教育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三是研讨会与专业发展活动,主要通过工作坊、迷你课程等形式,为博士生提供集中、精练的教育政策知识与实证研究方法培训^[14]。Stanford CEPA 的本科生培训项目核心是为本科生提供与 Stanford CEPA 教师、研究生合作开展教育政策研究的直接机会。对定量教育政策研究感兴趣的本科生可申请担任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s, RAs),与教师、研究生协同推进项目研究^[15]。通过参与 Stanford CEPA 的各类训练项目,本科生能够系统掌握教育政策分析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为后续从事教育政策相关工作奠定专业基础。

Stanford CEPA 的跨学科教育政策人才培养培训项目被认定为美国顶尖的学术培训项目,在全美排名第一^①。其毕业生在教育政策领域大多能获得具有影响力的相关职位,在美国社会各行各业产生深刻而正面的反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三)生态系统维度:Stanford CEPA 的多元主体共生网络

Stanford CEPA 将母体斯坦福大学作为其核心生态位,以斯坦福/旧金山联合学区伙伴关系

(Stanford/SFUSD Partnership)为核心生态锚点,逐步拓展与纽约、迈阿密、密尔沃基、堪萨斯城、奥克兰等地学区^②的合作关系,与学区所在地区政府、媒体、社会公众多元联动,共同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多元主体共生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不同主体在角色和功能上实现生态位互补。作为 Stanford CEPA 生态系统的核心,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与美国加州第七大学区——SFUSD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制度化的合作促进双方研究与实践的互惠共享,以研究赋能,系统提升了旧金山联合学区(包括 13 所早教学校、72 所小学、13 所初中和 14 所高中^③)全体学生的学业发展水平。为夯实合作基础,双方共同建立了一个数据库,用以支持利用旧金山联合学区行政数据的数据驱动式研究项目。数据库负责人通过与学区办公室合作,安全地接收和传输旧金山联合学区相关数据,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经批准的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Stanford CEPA 形成了由研究人员与学区的决策者、实践者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围绕学区在数学成绩停滞、多语种学生教育以及学校合格教师配备等方面面临的实际挑战开展研究。

在生态系统的价值转化环节,Stanford CEPA 承担多重角色、发挥多元作用:作为服务提供者,为研究人员和地区决策者提供从研究开发到研究生产及应用全流程的定制化辅导服务;作为系统协调者,负责协调数据协议、支持研究提案的协作开发,并为研究人员与地区决策者搭建沟通交流桥梁;作为价值转化者,系统记录和维护研究简报,积极拓展成果发表平台与经费资助渠道,着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学区决策有直接参考价值的研究简报、政策备忘录和决策支持工具^④,并通过 Stanford CEPA 官网和其他媒体,促进学术成果最大范围的传播与转化。Stanford CEPA 通过构建资源要素互通、学术成果共享的多元主体共生网络,实现了学术研究向教育政策的高效转化,被认为是依托协同创新激活学术核心领域的典范。

① 参见网页: https://browse.library.kiwix.org/content/wikipedia_en_all_maxi/Center_for_Education_Policy_Analysis。

② 参见网页: <https://www.caedpartners.org/research-practice-partnerships/stanford-sfusd-partnership/>。

③ 参见网页: https://www.sfusd.edu/schools/enroll/apply-upcoming-school-year/discover/discover-our-schools?search_api_fulltext=%20schools%20%20enroll%20discover。

④ 参见网页: <https://cepa.stanford.edu/aboutus>。

三、Stanford CEPA 对我国高校智库影响力提升的启示

相较于 Stanford CEPA 这一世界一流高校智库在美国教育政策改革与创新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我国高校智库在支撑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实现方面的作用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结合我国高校智库发展所处的实际环境,我国应从强化组织架构和制度设计、促进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拓展社会服务职能以及提升政策转化效能等方面全面提升高校智库影响力。

(一)整合有效资源,优化组织架构和制度设计

Stanford CEPA 基于学术项目的跨学科研究团队组织模式,不仅实现了斯坦福大学多学科资源和跨学科科研人才的深度融合,更有效激发了研究人员开展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内生动力,进而通过深耕创新性研究推动教育政策变革。反观我国高校智库,其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多数智库属于非实体研究机构,且多依附于其他院系,普遍缺乏专职行政管理团队;研究人员多以教育学、管理学等单一学科背景为主,研究视角相对局限,这直接削弱了高校智库的自主性、灵活性与创新性。

为有效统筹内外资源、推动我国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可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高校智库应探索构建“专业委员会—跨学科研究团队”两级内部治理结构,同步设立专职行政管理团队,专门负责智库研究项目的人、财、物等资源管理,协调智库与所在高校、区域政府、媒体及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关系,保障智库决策咨询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其中,专业委员会结合智库自身资源与优势,明确智库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向;其下属各跨学科研究团队则承担具体项目的论证、设计与实施工作,并直接向专业委员会负责,确保智库高效有序运行。另一方面,高校智库应强化跨学科研究团队建设。研究团队的结构具有多样性,能够使智库在应对决策问题时,从多元角度与层面提出更客观、理性、全面且务实的结论^[16]。可探索实施“揭榜挂帅”制度,通过重大项目招标吸引不同高校、院系的跨学科人才,组建国际化高水平跨学科研究团队。在配套制度层面,通过设立专项经费、单列职称评审指标、完善跨学科成果认定机制等举措,切实保障跨院系、跨学科兼职教师的合法权益,充分激发团队创新活力。

(二)转变研究范式,推进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

Stanford CEPA 坚持问题导向,以采用大规模且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闻名,致力于为教育政策制定提供真实数据支撑以及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有效发挥了其作为知识中介的关键纽带作用。反观我国高校智库,研究仍主要依赖经验归纳与思辨阐释,缺少大规模调查研究,且多服务于所属高校改革与发展,对公共政策支撑性研究的开展相对不足。

为切实提升我国高校智库对推动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的贡献度,需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圈层三个层面优化完善。在研究内容层面,高校智库建设应强化问题导向,聚焦教育领域热点与难点议题,打造教育决策部门信得过、用得上的高质量智库产品,在形成自身核心研究专长的基础上,逐步拓展研究范围与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层面,应将实证研究方法置于核心地位,系统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可视化等新技术与新方法,在教育政策咨询报告及建议中融入基于真实教育数据的定量分析、面向教育研究对象的调查统计分析,以及深入教育实践的案例观察与总结,以此提升智库科研成果的规范性、科学性与可行性。在研究圈层层面,我国高校智库应突破思想圈层的局限,强化异质性文化圈层的沟通与交流,搭建智库专家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桥梁,消除二者之间的认知隔阂,使学术项目真正扎根教育实际,让学术成果切实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提升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三)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拓展社会服务职能

作为依托斯坦福教育研究生院建立的跨学科研究中心,Stanford CEPA 不仅通过学术成果转化服务教育决策,助力教育变革与发展,更是通过跨学科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育政策研究与实践人才,以其对行业发展与公共教育建设的突出贡献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一个具有高水平、高影响力的智库,必然在学科理论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政策建议质量、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有显著成果^[17]。Stanford CEPA 的经验同样表明,智库的知识生产、传播与人才培养职能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

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应重视人才培养对扩大智库社会影响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作用,充分运用高校学科门类齐全、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构建完善的智库人才培养体系。在具体实践中,需积极宣传智库核心研究领域,引导本科生选修教育政策研究课程,推动硕士生、博士生深度参与智库项目研究,通过将学生置于真实的研究实践场景中,培养其处理复杂政

策问题的综合素养与能力。鉴于教育政策研究的复杂性,高校智库可对学生实施跨部门、跨院系的联合培养方式,提升学生跨学科整合资源、协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应用新兴科技的能力,使其在走上教育政策分析相关岗位后,能够熟练运用大数据、数据可视化技术、机器学习等先进工具,开展复杂政策问题的分析与预测工作。只有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抓手,使人才培养这一智库核心“产品”具备较强的传播辐射力与应用辐射力,我国高校智库才能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持续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四) 构建多元主体共生生态,提升政策转化效能

Stanford CEPA 通过构建涵盖高校、政府、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多元主体共生网络,形成了一套多元化、系统化的学术成果转化机制,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高效整合高校优势资源,形成核心竞争力;二是搭建校地战略合作网络,深度参与区域教育政策决策;三是借助官方网站及其他官方媒体平台,定期公开发布学术成果,加速知识扩散与成果转化进程;四是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学术研究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各类资源的开放共享与高效利用。反观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当前普遍面临发展模式趋同、多元主体协同性不足、政策转化效能偏低以及社会服务能力存在明显短板等困境。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功能复合型智库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高校智库建设可从四个方面着力推进。首先,立足自身特色优势,紧扣社会现实需求,科学确立智库发展战略与实施举措,避免同质化发展。其次,构建与高校、政府、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协同合作机制,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创新,赋能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再次,拓宽学术成果宣传渠道,加强与权威媒体的合作,通过输出高质量学术成果与专业政策观点,持续扩大智库的知名度与社会影响力。最后,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培育智库研究团队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将复杂社会问题转化为可操作治理方案的系统性实践能力^[18];同时,构建智库特色人才交换“旋转门”机制:一方面,支持智库研究人员到相关机构挂职锻炼,积累实践经验;另一方面,通过特聘、兼职等形式,吸引相关机构人员参与智库工作,开展经验推广与交流,收集更高质量的实证“证据”,助力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在动态变化的问题场景中寻求到适宜的决策路径,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四、结 语

在美国的决策体系中,智库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被认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19]。凭借强大的专家团队与精湛的研究实力,美国智库以专业研究为支撑参与教育决策过程,并持续产生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本文构建高校智库影响力的“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三维分析框架,以世界一流高校智库的典型代表——斯坦福教育政策分析中心(Stanford CEPA)为研究样本,系统剖析了其组织结构、主要功能及其所处生态系统,探究其作为世界一流高校智库的影响力提升机理;进而结合我国高校智库的发展现状与困境,分别从组织结构、实证研究、人才培养以及构建多元主体共生生态等方面,为我国高校智库提升影响力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随着社会各界对智库地位与作用的认知不断深化,以及我国高校智库自身能力的逐步提升,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重点围绕智库大规模公共数据服务平台的搭建、智库校地协同建设、多校联合共建模式探索以及智库数智化转型提升等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助力我国高校智库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Ulloa C, Mendizabal E, Terán E. State of the Sector 2025 Report: Trust in Evidence in Challenging Times[R]. A Global Consultancy and Platform for Change, 2025:7.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第十五场:介绍从数据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成效[EB/OL]. (2022-09-27)[2026-05-03].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75/>.
- [3] McGann J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larly Commons, 2021:54.
- [4] 刘在波.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经验与展望[EB/OL]. (2025-08-05)[2026-05-03].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8/t20250805_5909312.shtml.
- [5] 姜朝晖, 兰思亮, 李洋. 世界一流高校智库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及其启示:以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例[J]. 重庆高教研究, 2025, 13(4): 114-119.
- [6] 程飞亚. 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智库建设之道: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为例[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26, 42(3): 308-318.
- [7] 刘青, 郭嘉如, 赵岫岫. 我国高校新型智库能力提升对策研究:基于智库成果的分析[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5, 10(1): 105-113.
- [8] Chinde Ponce L. Think Tanks 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The Perceived Role of FGV in Bridging Academia and Policymaking in Brazil[D]. Krems an der Donau: Donau-Universität Krems,

- 2025;5.
- [9] 张春花,孙玉玲. 国外智库影响力、透明度和绩效评价研究与实践进展[J]. 情报杂志,2022,41(4):90-97.
- [10] 刘璐璐,史静寰. 高校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构建:理路、原则与指标——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J]. 现代教育管理,2022(2):29-37.
- [11] 金晨. 我国高校智库影响力及其提升研究:基于一流高校智库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2019(7):63-69.
- [12] 陈文博,周垚. 新型研究型大学经费配置结构与职能实现的关系: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案例分析[J]. 教育评论,2025(11):18-29.
- [13] Tsujimoto M, Kajikawa Y, Tomita J, et al. A review of the ecosystem concept: towards coherent ecosystem design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 136: 49-58.
- [14]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Programs[EB/OL]. (2024-03-20)[2026-04-24]. <https://cepa.stanford.edu/training/doctorate>.
- [15] CEPA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EB/OL]. (2024-03-20)[2026-04-18]. <https://cepa.stanford.edu/training/vpue>.
- [16] Lyu Q, Bielefield A, Liu Y Q. Academic pursuits and involvement in decision-making: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U. S. university think tank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23, 13(3): 93-101.
- [17] 翟崑,韩卓希. 加强高校区域国别智库建设,完善区域国别学“三位一体”学科建设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5(6):15-25.
- [18] 彭建交,李雪莲,刘邦凡. 中国智库发展中的专家行为模式及其对公共决策的影响[J/OL].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6-04-13]. <https://link.cnki.net/urlid/10.1413.N.20260410.1723.006>.
- [19] 关琳,李刚. 从资本到政策:美国智库募款行为研究[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26,11(1):65-75.

(责任编辑:陈丽琼)